

十年建设时期之左倾错误对中共权力运行秩序构建的危害

朱庆跃

(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安徽淮北, 235000)

摘要: 1956—1966年这一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期,因各种因素而产生的“左”倾错误,给党的权力运行的实践、权力运行秩序本身的规范化构建带来了危害:在政党文化层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严重干扰了权力运行的正确方向;在政治社会化层面,日益呈现“革命”性和庸俗化倾向,封建观念未能消解;在组织权力运行体制层面,日益高度集权化,削弱了权力监督内生动力;在权力运行体制内部关系层面,法制建设衰退化,加剧了制度规范的总体缺失;在政治关系层面,党际关系、党与社会组织关系日益封闭,造成权力外部监督群的缺位;在政治行为层面,初步探索的制度型反腐路径逐渐摒弃。

关键词: 十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党的权力;党的建设;权力运行秩序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4)02-0135-08

对于党的权力运行来说要使其更加有效,首要问题就在于规范党的权力运行秩序。正如亨廷顿指出:“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1] 党的权力运行秩序的规范化构建是个复杂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党文化(解决权力运行所遵循的价值准则问题)、政治社会化(解决权力形式主体的政治人格完善化问题)、政治制度(解决权力运行的制度支撑和规范约束问题)、政治关系(解决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来源的问题)、政治行为(解决当权力运行出现异化现象时,党应采取何种态度和措施的问题,以及如何组织党员群众参与规范权力运行的实践问题)等层级。1956—1966年这十年艰辛探索期,党在指导思想及其各项工作中(包括反腐倡廉建设)除了有一个正确倾向之外,还内存一个与之犬牙交错、相伴相随,并进行激烈交锋的错误倾向。因此,着力去探讨这一阶段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党的权力运行秩序的失误化构建状况及其教训,有助于揭示这种错误倾向为何在以后较长时间段中取代正确倾向的根源,也为以后党立足环境变迁,正确调构权力运行秩序以避免陷入错误的轨道,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一、政党文化层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严重干扰了权力运行的正确方向

20世纪50年代的后期至60年代的初期,尽管党

的指导思想上总体坚持了“八大”所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的指引,但正确倾向中也隐藏着一些错误倾向,而这些错误倾向经过错误的实践与错误的理论不断变化作用下,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的恶化这一“催化剂”的外部作用,得以不断地升级,逐渐取代了正确的倾向。最明显标志就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以党的会议公报的形式正式提出了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2](653)}从党的权力运行秩序视域看,政党文化层面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干扰了权力运行的正确方向。因为它将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革命时期的发展程度性(集中体现在党领导民众推翻压制民众权利实现的旧统治和旧秩序,即解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实现的外部条件保障问题)与建设时期发展程度性(主要表现为着力领导和支持民众实现和巩固权利,即解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实现的内涵程度问题)相混淆,压制了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在建设时期向更程度的发展,违背民众的权利诉求。另外,也将建设时期权力异化滋生的内生源与外生源的主次关系相混淆。如果说革命时期,党的权力异化现象特别是腐败行为的发生,主要受权力运行外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和诱发,那么建设时期则主要受权力运行体系内在某些环节、部分的不完善的影响。这就决定建设时期反权力

异化的正确路径是坚持群众路线和制度建设,而不是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

这种错误政党文化的形成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不可否认其中关键性因素就是社会主要矛盾方面的逐渐错误判断与对社会阶级状况的不断主观随意性理解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前者为后者打开了“潘多拉匣子”,后者又反过来为前者提供了所谓直接的“理性辩护”。具体来说,这一阶段党在社会主要矛盾方面的逐渐错误判断,即从对“八大”主要矛盾定性的总体认可到部分否定,再到完全否定的过程中,经历了三个不断“上升”的层级:社会任务由解决人与物关系为主到解决人与人关系(非对抗性关系)为主;人与人关系的解决性质由非对抗性到对抗性;人与人对抗性关系的指涉范围由社会层面引入到党内层面。而每一次的错误化“升级”中,都随后伴有在社会阶级状况方面的错误化注解。如第一层级“升级”中形成了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完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依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但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表现为敌我矛盾(资产阶级右派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的情况是比较少数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大量的”^{[3](4)};随后在社会阶级状况上的注解为国内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之一。第二个层级的“升级”中形成的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定性:在整个过渡时期即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3](288)};随后在同年11月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给出的“理性辩护”就是社会上还存在着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经济上消灭阶级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消灭阶级”^[4]。第三个层级的“升级”对主要矛盾的错误化认识为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争不仅表现在党外,而且表现在党内,如毛泽东在1959年8月所写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批语中,就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5](524)}随后在阶级认识方面给出的理论依据为党内存在着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1964年12月毛泽东在陈正人(当时的农业机械部部长)1964年12月4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中所写的批注中,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3](265-266)};1965年1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明确强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

义的阵地”^{[6](21)}。

二、政治社会化层面:日益呈现“革命”性和庸俗化倾向,封建观念未能消解

错误的政党文化除严重干扰了权力运行的正确方向之外,另外也使得政治社会化也日益陷入错误轨道,最明显就是1962年后的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取代了经济、政治领域,日益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领域,政治社会化承载着所谓的“继续革命”“全面专政”的负功效。

其一,就科学化意识形态内的“斗争”,日益呈现浓厚的“左”的倾向。具体来说,改变了之前比较理性和务实的态度,代之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与边缘意识形态的残余思想在科学层面之间的“斗争”,乃至因新实践的变革而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总体共识下的内部分歧、差异“交锋”,都视为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在思想层面的表现。从权力运行秩序规范构建看,这必然造成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边缘意识形态的残余影响,因为这种批判更多地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学理层面的成分。同样,思想斗争矛头的重点偏向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致使诱发权力异化的一些封建思想,因与无产阶级思想有了一个共同的“对立面”而得以借“壳”(即貌似无产阶级思想)还魂。另外,它也使反权力异化斗争日益偏离正确的轨道,并陷入到越反越多的“困境”中。因为一些诱发权力异化的思想根源即劣变生态因子并没有得到清除,而另一方面从阶级斗争的思维看权力异化现象,加重了对思想文化领域乃至社会领域的阶级斗争严重性的判断;错误的思想理论又造成了错误的实践,以致彼此不断的交互作用而“万劫不复”。

其二,就观念化意识形态的学习和宣传上,日益出现了庸俗化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反映在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上,如1960年邓小平在天津会议的讲话中,就指出当时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存在着庸俗化问题,一味地把“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7](140)};1961年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中,指出了当时在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庸俗化、不真实性的现象。简单庸俗化就是将任何事情

包括日常生活中琐碎之事的成功都随意附会是执行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不真实性就是进行“‘客里空’的假报道，……有些文章不从政治上着眼，去描写领袖的作用和特点，而是过多地描写生活琐事。……把一些毫无意义的生活琐事也写进去了。在一些描写领袖革命事迹的作品中，还发现有借描写领袖来标榜自己，渲染自己，吹嘘自己等错误和缺点”^[8]。而这种庸俗化倾向登峰造极的表现或者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莫过于林彪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一段发言，强调工作中所出现的困难就是“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或是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很大的干扰”的结果，因为“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2](107-108)}。从权力秩序规范化构建视域看，这种庸俗化倾向严重削弱了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的效果，使党的权力形式主体不能有效地将正确的观念化意识形态内化为指导其政治行为的正确政治态度，从而促进政治人格的完善。另外，这种庸俗倾向也极易滋生盲目崇拜真理的“人格化”，造成了个人崇拜现象的发生，而加大了对权力监督尤其是“一把手”的难度，因为它在压抑民众主体意识的同时也助长了权力行使者的独断意识。

三、组织权力运行体制层面： 日益高度集权化，削弱了权力 监督内生动力

1957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后，党的组织权力运行体制日益朝向高度集权化的趋势发展。如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贯彻执行方面日益被“扭曲化”，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被毛泽东发挥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3](51)}；党内“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地位方面逐渐被“虚置化”，如1959年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明确强调“权力集中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9](196)}；党内民主生活方面趋向形式和庸俗化，特别在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后，党内民主气氛受到严重的压制，民主生活会基本上变成了一言堂和个人崇拜会、表忠诚和显决心会。这点可以通过1962年7月刘少奇在下放干部会议上所揭露的现象获得体现：“看领导上的意图讲话，你要求什么，喜欢什么，他就把那方面的情况反映给你，这种情况恐怕相当普遍，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一种不良的风气”^{[10](458)}；党内决策方式方面越来越“个人化”，如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八大有

关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1958年全国范围内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开展反击“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阶级斗争理论的系统化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错误定性，都明显具有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烙印”。党内领导体制的日益高度集权化，其后果就是遏制了党内民主的健康的发展，加大了权力异化的风险率。因为缺乏民主的领导体制容易导致党内权力的形成和授予缺乏正当性；在运行中失去了规范有序性；在运行结果上不具有合理有效性。“只有存在党内民主，党规党法以及由此形成的党内制度才具有有效运作的政治基础和体制条件；只有存在党内民主，党内的权力运作才是有限的权力运作，党内权力作用的客体才是权利有保障的客体。”^{[11](221-222)}另外，也严重削弱了权力监督的内生动力源，因为党内民主是党内监督的前提和基础，而缺乏党内民主的发展，党内权力机构间的相互制衡机制不可能彻底、科学的实现，以权力监督权力只能是“形同虚设”；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权利，要达到以权利制约权力，同样只能是“海市蜃楼”。

上述高度集权化的组织权力运行体制之所以逐渐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历史与现实的根源，又有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如从党的历史层面来看，与革命时期党内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惯性影响密切相关，是不能彻底摆脱其束缚作用的结果；也体现出党过于寄望在执政后能继续保持和发挥其正功能的心态，而忽视了新环境下其隐藏弊端有显性化和扩大化的可能。从社会现实层面来看，与在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所出现的曲折化有很大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是探索实践遭受挫折后回归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如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高度集权行政管理体制)在党内体制的体现和反映，这也就导致了高度集权化党内领导体制往往以维护和实现所谓“正统”社会形态即传统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纯洁性运行着。从思想认识层面来看，与对社会主义民主观和个人崇拜现象等方面的错误认识密不可分。如错误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强调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12](66)}；社会主义的民主优越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要体现在“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一民主形式上。这就造成了对民主目标价值追求的缺失，忽视了民主制度本身的建设。个人崇拜这一阶段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由崇拜“真理”演变为崇拜真理的“人格化”。这也就为实施党内集权体制特别是个人专断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说辞，因为真理掌握在这部分人手中或者说这部分人代表了真理。可见，社会

主义主观和个人崇拜观的错误化, 变相地使这种高度集权领导体制带有浓厚的捍卫和实践着这一错误的价值(即所谓的“真理”)共同体的味道。

四、权力运行体制内部关系层面： 法制建设退化，加剧了制度 规范的总体缺失

党的权力体系主要分为由以党的组织体系为载体的权力体系和掌控、运作政权的权力体系两部分，但这两种权力体系又因在具体的权力来源、直接目标、内部运行规律等方面存在差异性，致使彼此间的替代、侵袭，如或用前一种权力体系代替后一种的以党代政现象，或用后一种权力体系取代前一种的以政代党现象等，都会造成各自权力体系的“失范离轨”，从而加剧权力异化现象和行为的发生。另外，党政关系表面涉及到党的组织权力体系、政权的权力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其背后蕴含着如何对民众的权利进行维护和保障的实质。因为相较于党的组织权力体系，政权的权力体系是民众权利的直接授予和委托方，这就决定了如果党的组织权力体系对政权的权力体系的过于干涉，将会造成对民众权利的侵袭，助长政权中党员干部权力异化现象的滋生；同样如果党的组织权力体系不对政权的权力体系进行必要的指导和监督，则又会出现政权的权力体系对民众权利的虚假代表和直接伤害。可见，要规范政府权力的运行秩序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加强社会主义宪政民主建设。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主政治就在于自觉地设置了一个“前提”即对公共权力消极面进行主动的限制(即依法治国)，以及规划了一个有效的“通道”即将宪法由法理形态积极转化成实践形态，旨在防止权力运行中异化现象的发生。

1957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却出现了退化趋势(最后到文革时期中断)。这固然与逐步升级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密不可分；但从法律制度建设本身来看，与日益发展的错误法治工具价值理念和不断高度集权的党政一元化体制也有很大的关系。日益发展的错误化法治工具价值理念，将民主法制建设引入到错误的路径中；而高度集权的党政一元化体制，又不断侵袭和消解民主法制建设已获的成果，乃至使其处于有名无实的“虚置”状态。

其一，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理念：“大民主”的逐渐不谨慎使用。其中最明显就是对民主价值属性、功能

的不正确判断上。因受“波匈事件”的刺激以及不能完全摆脱革命战争年代思维习惯方式如阶级斗争观念、群众运动方式的影响，毛泽东改变了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向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学习的理念(如薄一波在所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就回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第一次讲话中谈论中央和地方关系时提到学习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思想^[13])，而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是代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没有任何抽象的民主，只有具体的民主，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就是典型。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12](66)}。这种改变，本意是避免国内在政治层面上出现一味追求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而忽视无产阶级民主优越性的倾向；但是却间接否认和放弃了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民主生活的健全这一民主内在价值的追求，而过于注重了民主的工具价值。这种错误倾向的发展，也就为原来还比较谨慎地使用的“大民主”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充分发挥，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具有更高的优越性。另外，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所实践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大民主”寻找到了“合适”的具体形式。同样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后日益升级的阶级斗争理论，特别是将阶级斗争理论由党外引入党内，认为党内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这就为“大民主”的滥用提供了第二个“合法性”凭藉，因为官僚主义所引发的问题，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是敌我矛盾、阶级斗争的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应该如革命时期一样采取“大民主”的形式去斗争阶级敌人。可见，“大民主”的实践，把已初步探索的民主法制建设引入到了错误的路径中，因为从形式来看，它违背了民主作为一个国家制度是国体和政体、手段和目的的统一，一味地追求积极性民主而忽视了消极性民主；不够条件盲目地强调直接民主的运用而否认了更切当时实际的间接民主形式的采用；忽视了实质而过于注重从形式进行两种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比较，这也无形中造成“大民主”使用中“面”有阶级性而“里”无阶级性的尴尬境遇，从而容易为不法分子所使用，造成社会的混乱。另一方面即使退一步从内容上来看，将这种“大民主”视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内在价值民主的追求，那么这种追求只能说在当时依然

是一种理想状态，民主的建设需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上层建筑各环节的日益完善的。从反权力异化看，当时“大民主”价值理念的提出虽是基于反官僚主义这一滋生权力异化的间接诱因的，却忽视了从党和国家自身的管理体制方面寻找官僚主义滋生的缘由并进而探索遏制、解决此现象的路径。这就使得反权力异化运动轰轰烈烈，表面遏制了官僚主义，但却保留了官僚主义的“根”，反官僚主义(包括反权力异化)陷入到越反越多的困境中。另外，运用了革命时期针对反动统治阶级这一民主运动形式，也易将官僚主义的解决这一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敌我矛盾的问题相混杂，客观上助长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也隐盖了对权力异化的真正实质性解决，因为不能“有的放矢”。

其二，民主法制制度：日益“一元化”党政体制的不断侵袭。这一阶段伴随着党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固守化以及在行政管理上“分权式”体制探索的中断，使得1953年后所滋生的全国执政时期党政“一元化”体制又在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强化。这些强化除了表现为集中化的经济管理体制(经济层面)和集权化的行政管理体制(纵向政治层面)上，还特别表现在横向的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方面，即政权机关的权力向党的组织权力系统的高度偏移与集中。通过以下这一期间的领导人讲话和文件，可以获取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如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印发的由毛泽东所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要求“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不得违反”^{[12](488)}；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所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指出党对政府的领导原则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3](51)}；1958年6月下发的《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明确主张“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的思想，强调“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要求设置五个小组直接而具体地分管国务院的工作^[14]；1959年，在八届七中全会准备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再次突出了“权力集中常委和书记处”的思想^{[9](196)}；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更是将“一元化”解释为党领导一切，“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2](131-132)}。可见，这种横向的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方面的“一元化”体制，实质上通过确立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地位，使“政府完全成

了党的组织体系内的一部分”^{[11](52)}。

五、政治关系层面：党际关系、党与社会组织关系日益封闭，造成权力外部监督群的缺位

“左”倾错误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封闭型党际关系，造成了党的权力外部监督群的部分缺位。如以反权力异化作为观察问题的视角，那么党在全国执政后所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应该更宜被解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互相监督制度”^[15]。因为从党的权力的授予和委托源来看，其中代表特定群体利益的民主党派将其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进行让渡，是其重要的来源之一。这就使得要保持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必须将民主党派这一重要的政治力量引入到权力运行环节中，这旨在既及时吸纳他们对权力如何进行有效有序运行的建设性意见，发挥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纠错”功能；也使得有一个强有力的外部监督群的设置，而避免党的权力运行结果的异化，真正实现“历史周期率”的跨越。但伴随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而造成的党在社会主要矛盾、社会阶级状况方面的判断和定位不断失误化的情境下，党际关系的封闭型渐成气候。相较之前的那种开放式党际关系，封闭型党际关系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质，即由原来的直接的当然的“权利共同体”变成了间接的可能的“权利共同体”，由原来的双向式互动监督变成了下压式单向度监督。这两方面可以通过这一阶段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后，“左”倾错误指导下民主党派的主体力量——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定性和政治实践中的角色得以体现。如在民主党派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定位，最明显的体现在1959年《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文件中。在这一文件中，党对1957、1958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运动发生的正当性就在于“占多数的中间分子存在着两面性，现在他们中间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人民公社和群众运动还有着不同程度的动摇、怀疑和不满。只要资产阶级还存在，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每一个重要关键前面一定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反复”；指出即使这些运动开展了，多数人受到了相当深刻的教育，但是“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还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教育”^{[5](641-642)}。这实

质上反映了党对广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层面,即是否真正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自信和担忧,他们有可能而不是当然的“权利共同体”,是间接的有待考验的而不是直接的忠诚的“权利共同体”。相应地,对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体力量的民主党派的政党地位必然由原来“八大”的“部分劳动者的政党”^{[10](246)}这一鲜明定性而演化为模糊状,既是友党又非友党,既是参政党又非参政党,甚至严重时将其视为“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16]。在这种尴尬的情境下,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异体监督功能很自然不可能获得彻底的政治保障。另外,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后知识分子的政治实践中的地位及其活动表现,也体现了这种封闭类型政党制度所承载的监督功能的“变味”,更多地是下压式单向度监督,即这种监督更主要地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而不是侧重于党的权力运行情况来展开的。如1959年9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就指出通过对右派的“一系列的教育和改造工作”,促使了他们“多数人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和分化”^{[5](364)},呈现出大多数已经低头认罪、确实悔改或者表示愿意悔改的良好态势。即使在对“左”倾错误进行调整的关键之年——1962年,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讲话中,依然强调知识分子彻底实现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向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仍需要一个长期的思想改造过程,希望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实行自我改造,以追求更大进步。可见,知识分子当时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如何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思想改造来实现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这张“皮”的依附,而帮助党开展整风即对其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已经与他们“渐行渐远”。

“左”倾错误指导下的政党主宰性社会模式不断地削弱了社会组织的独立意识与民众的权利意识。为了使有限的社会资源能够充分的聚集,从而推动生产力的不切实际的“跃进”,同时也为了配合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和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发展的需要,党于1958年对众多社会政治共同体,采取了通过“政治权力机构直接‘嵌入’”^[17]的方式,以使其成为国家行政机构的一部分,而不是以前的通过党团给予间接式的领导。另外,不断升级的“左”倾错误也从文化层面实行了政党理念对众多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完全“嵌入”。如果说前一个政治层面的“嵌入”,是对社会组织的独立意识直接消解,那么后一种思想层面的“嵌入”则是对社会组织中民众权利意识的肆意侵袭。这些也从根本上就改变了之前的政党主导性社会模式,而转向了政党主宰性社会模式或者称为政党

全控型模式。具体来说,政治层面的“嵌入”表现在:如对合作社的群众经济组织上,通过生产关系的“跃进”将其转化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达到政治权力与社会组织的“无缝重合”。“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3](447)},“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2](615)}。在党与工会组织关系上,1958年3月成都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意见》,在工会领导体制方面将“双重”领导的次序实现了调换,规定了要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而不是以上级工会领导为主;同年11月郑州会议错误提出“工会取消论”。在思想层面的“嵌入”,同样也集中体现在这种“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中,在日益升级的“左”倾错误指导下,人民公社的发展动力和巩固的保障不在于民众合法利益满足下的积极性、主动性,而在于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的加强,“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在人们的思想上继续破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立共产主义”^{[3](452)};人民公社的历史使命和组织定位不在于是对特定群众合法权益的实现上,而在于是“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即“第一,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第二,成为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3](601)};人民公社内部所存在的经济问题乃至权力异化问题,其性质不再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6](20)}。从反权力异化视域看,政治层面的“嵌入”,既破坏了群众组织原有的独立性,造成了对党的权力外部监督的“虚化”状态,也助长了群众组织内部的行政化,使组织内部的民众对组织里的领导干部的监督处于一种弱势状态;而思想层面的“嵌入”,导致了反权力异化斗争与反阶级斗争的日益混杂,既掩盖了权力异化滋生的真正根源,也造成了反权力异化斗争的日益扩大化。

六、政治行为层面:初步探索的制度型反腐路径逐渐摒弃

从权力运行秩序构建的政治行为层面来看,“左”倾错误倾向也对反权力异化斗争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具体来说,从交锋的结果来看,正确指导思想下构建的党的反权力异化政治体系逐渐被错误的政治体系所取代,反权力异化斗争遭受到了重大的挫折;更

重要地，从正确与错误的交锋过程(即错误化的思想在党内还未占主导地位之时)来看，错误化思想下的错误化实践，既不断侵袭着正确指导下构建的反权力异化政治体系的基础，而造成党的反权力异化斗争逐渐偏离了“八大”所确立的正确轨道，也在一些特定的时间段和领域中客观地诱发着众多劣变生态因子的滋生，从而造成反权力异化的实践效果要么与主观意愿“大相径庭”，越反越多；要么呈现出种种虚假的表相，而不具有持久性。对于这种交锋过程中的消极影响，可以从这一阶段前后两个重点的反权力异化实践(前期实践着重解决党政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后期实践突出了经济领域的权力异化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18])中各取反官僚主义和反对农村人民公社的干部特殊化风为例，获得佐证。

如反官僚主义，伴随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后党的指导思想的逐渐“左”倾，党在反官僚主义的问题也日益呈现出错误化倾向，最终导致将官僚主义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产物，将反官僚主义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争的所谓“政治高度”。从如下领导人的言论和党的文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党在反官僚主义问题上错误化倾向发展的脉络。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指出党内存在官僚主义就是因为党内存在一部分怀疑甚至反对以毛主席代表的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12](292)}；195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所作的《做革命的促进派》讲话中，就认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帐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12](608)}；1960年《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更多地把官僚主义发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外部的诱因，“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7](143)}；1964年7月，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党引用了列宁的言论以证明官僚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早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初期，列宁就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他们的习惯势力，从各方面包围和侵袭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个别阶层。这种情况，不仅使苏维埃机关职员中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分子，而且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19]；1964年12月底伴随着“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概念的提出，反官僚主义完全被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轨道中。作为扮演着为滋生权力异化提供了温润土壤“角色”的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

后的中国社会滋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党在自身组织结构和国家具体管理制度层面上的过分高度集中以及部分党员在胜利面前滋生骄傲自满情绪的影响；也与外部环境中封建制官僚陋习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这就决定了要取得反官僚主义的胜利，必须要首先对官僚主义滋生的原因进行具体的分析，对何种类型的官僚主义进行科学的定性，唯有如此才能“有的放矢”。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指导思想逐渐占据党内统治地位这样的情境下，不仅不能正确分析其滋生的原因和提出相应正确化措施，相反有时因阶级斗争理论的不断升级而日益“人为”的扩大化，最终导致了一场以反官僚主义为名义的内乱——“文革”的爆发。

反干部特殊化风基本的境遇和反官僚主义“如出一辙”。农村中出现的干部特殊化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制度方面的原因，就是人民公社的“党政合一”体制，而伴随着指导思想的不断“左”倾，乃至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视为一场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运动，而不是什么处理“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6](20)}，其结果就如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评价的那样：尽管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但所解决问题的错误定性导致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0]；同时这场运动没有达到当时“左”倾主义者的主观愿望，相反在阶级斗争思维下恶化了他们对社会形势的判断，结果造成了从其他领域撕开更大的“裂口”以开展反资产阶级运动这一“悲剧”的上演。

参考文献：

- [1]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8.
- [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553.
- [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 [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 [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

- 社, 1996.
- [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218-220.
-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10] 刘少奇选集·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11] 林尚立. 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 [1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 [13]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488.
- [14]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9卷[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628.
- [15] 浦兴祖. 关于我国政党制度“类型归属”与“理论概括”的思考[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05(2): 55.
- [16]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0—1987)[M].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8: 572.
- [17] 师晓霞. 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执政党与社会关系研究[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 56.
- [18] 王关兴, 陈挥.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267.
- [1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34.
- [20]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807.

On “left” errors tendency harmed to the Party’s power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during 1956 to 1966

ZHU Qingyue

(The Politics and Law Institute,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1956 to 1966 of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period, “left” errors which were caused by various factors tendency had a devastating effect not only on the party’s power operation practice, and more seriously on the power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in itself. These negative effects are found at many levels of the power operation construction, such as in the party culture level, the erroneous tendencies of class struggle seriously interfered with the right direction of power operation. At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level, increasingly showing the “revolutionary” and vulgarizing, feudal ideas failed to diges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power system, which was more and more centralized and which weakened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the power supervise. In the internal relations of the power system, the recessional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led to the overall lack of institutional norm. In political relations, inter-party relations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art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creasingly closed, which resulted in the absence of the power external supervision group. At political behavior level, the system type of anti-corruption path was explored gradually abandoned.

Key Words: ten yeas of construction (1956—1966); “left” errors; the party’s power;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the power running order

[编辑: 颜关明]